

论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

郭国祥 覃雅兰¹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锋队性质、始终无所畏惧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力量。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背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是涵养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基础，早期革命先驱艰苦卓绝的建党实践是生成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依据，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是塑造伟大建党精神的主体力量，北京、上海和嘉兴是养成伟大建党精神的主要空间场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伟大建党精神 生成逻辑

【中图分类号】 D26;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22)04-0005-09

在建党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新范畴，并对其内涵和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提到“伟大建党精神”，并号召全党“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性贡献。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内在气质和精神风范的集中表现，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开拓创新、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是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支撑。伟大建党精神不是无根之木，不是无源之水，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逻辑。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背景

歧路彷徨，翘首怅望。这是近代中国人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之时的最初状态。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人物才在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坚定方向，看到希望。

清朝末期，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政府的颓废无能，严重激化中国内部矛盾，农民阶级在洪秀全的带领下率先揭竿而起。洪秀全为传统农业社会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土地确立了平均分配的详尽方案，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只是“植根于传统小农社会土壤之上的具有巨大诱惑力而又永远无法实现的社会乌托邦”²，根本就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而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尽管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和美好的社会理想，但却无法摆脱小生产者与生俱来的自私、狭隘、散漫和保守，只能憧憬脱离实际的小农社会理想。因而，他们无法提出科学的改革方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山河破碎的社会现状，更无法完成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

面对外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内部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地主阶级的洋务派开展了自救运动。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创办近代企业，建设近代军队，发展近代教育，希望在巩固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近代化。然而，“洋务运动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终结”³。从根本上来说，洋务派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学习西方不过是封建王朝陈腐已极、风雨飘摇、病入膏肓

¹作者简介：郭国祥，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0；覃雅兰，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20&ZD022）

时的垂死挣扎。因此，在顽固守旧派的攻讦阻挠中，在既有思维模式的禁锢下，“自强”运动不过是“裱糊匠”对封建“破屋”的勉强涂饰，并未革故鼎新，并未根除病灶，因而无法推动中国走向彻底的蜕变和新生。甲午海战之惨败证明，既要巩固封建制度，又要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自强”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民族复兴，中国社会必须探索新的出路。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彻底暴露，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势危如累卵，一些对时局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呼唤政治变革。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尽革旧俗，一意维新”⁴的救国纲领，将器物层面的模仿推向制度层面的变革，鼓吹君主立宪以求国盛民昌。然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势力异常强大且顽固，而维新派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几个缺乏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因而失败的命运在维新运动发动之初就已经注定。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通过改良的道路实现政治转型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完成民族复兴的艰巨任务，必须动员群众，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

面对甲午战争后中国被列强瓜分的社会现实，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孙中山一生矢志革命。在辛亥革命前，他先后领导和组织了十次武装起义，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影响。由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则直接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遗憾的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未能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况。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找到中国的正确出路，也说明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无法成为改变黑暗中国的正确选择。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证明，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表现出英勇的反抗精神，也展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但他们的实践无一例外都失败了，都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正当无数仁人志士在艰难探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何方之时，俄国革命走进了新式知识分子心中，它“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⁵。在遭受强权战胜公理的打击后，在陷入对东西方文明的双重质疑之时，大批的知识分子选择“走俄国人的路”⁶。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把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主体力量，强调铁的组织纪律性。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具有矢志不移的革命精神和远大理想，呈现出与以往的革命团体和政党迥异的革命气质和战斗精神，毫无疑问将成为引领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土壤

树高千丈必有根，水流万里总有源。伟大建党精神既孕育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又承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重道义、重德性、重操守的气质与禀赋，赋予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心系人民、天下为公的使命与担当，成为滋养伟大建党精神的丰沃土壤。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源于古人对真理的孜孜以求和明理致用的文化特质。古人对真理的追求，以注重仁政德治和主体的德性修养而区别于西方对外部规律的探索和把握。当今人沿着中国往圣先贤的心路历程追溯他们的人生旨趣，就会发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囊括了不同层面的真理，充分展示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高超智慧。在宇宙层面，古人追求浩瀚世界之中抽象缥缈又无处不在的“天道”“天理”；在社会层面，追求“仁者爱人”“世界大同”的仁政德治，希望达成“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王道乐土；在个人层面，追求内圣外王、求圣成贤，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追求真理的同时，古人强调“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君子之于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以身”，“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反对知而不行、行而不笃。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崇实黜华、明理致用的文化特质，体现出践形见性、不尚空谈、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追求理想、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品格，成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建党精神的文化来源。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基于救国救民的价值取向和敢于担当的民族品质。回顾中华民族发展历程，无论是大一统的太平盛

世还是群雄割据的战乱时代，致力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崇高的理想追求，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与大势。千百年来，精忠报国的中华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从“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屈原，“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的岑参，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再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都体现了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成为早期革命先驱选择马克思主义、“群英结党救中华”的原动力。爱国主义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爱国主义精神的践行需要敢于担当的品格。这体现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激情呐喊，“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铿锵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凛然气节。正是始终坚守爱国初心和担当意识，中国共产党才成为大智大勇的寻路人、人间奇迹的书写者和腐朽历史的终结者。因此说，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建党精神是对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和担当意识的继承与升华。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始于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舍生取义是妇孺皆知的中华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人面对民族大义与生死冲突的价值选择。孔子有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被后世概括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其后，文武百家皆以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为衡量生死之标准，并不断发展、扩充。例如，朱熹指出：“义在于生，则舍死而取生；义在于死，则舍生而取死”。清初唐甄也认为君子有三死：“身死而大乱定，则死之；身死而国存，则死之；身死则君安，则死之”。而张巡、文天祥、邓世昌等无数英雄豪杰更是以慷慨赴义来践行舍生取义之思想，体现出为了社会安定、天下太平，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万民能救于水火而舍弃宝贵生命的高贵品质。自强不息，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积极入世、刚健有为的态度，也强调不屈不挠、持之以恒的精神。自强不息是范仲淹断齑画粥的动力，是魏源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的救国救民之药方（“非自强不能自立”），更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凭毕生之功改写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历史的情怀。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过多少上下求索的追寻，多少千难万险的跋涉，多少枪林弹雨的战斗，多少壮怀激烈的牺牲，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古代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与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熏陶。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根植于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和重民惠民的民本文化。古语云“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节义，百行之冠冕也”，忠孝节义一直是中国士大夫追求的伦理道德。它要求对国家尽忠，对人民尽职，对职业尽责，对父母尽孝，对朋友尽心。忠孝节义蕴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无私的献身精神，包含着为公共利益、人间正义牺牲自我的思想，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延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对党忠诚的建党精神正是对古代忠孝节义伦理道德规范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为千千万万党员永不叛党、誓死为党的英雄气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蕴藏着重民惠民的民本文化。《道德经》有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诗经》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曾谓：“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三国志》告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这些治世名言都一致强调顺民心、重民意的价值理念，明确了君主的权力来源和政治责任。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创新。

三、马克思主义是涵养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⁷马克思主义行，体现为它以强大的历史穿透力、社会解释力、未来预见力，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自觉选择，成为培育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基础。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求真精神和科学品格。马克思主义蕴含着突出的求真精神，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性。马克思主义从来不相信既定的一切，也从来不相信永恒的真理。它对现实充满了批判和否定，总是从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观察事物、分析事物。它廓清了抽象人性的思想迷雾，将人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指出现实的人是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的产物。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马克思博采众长，在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⁸。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一百多年的岁月里，它并没有因为创始人的离去而消失，而是大浪淘沙、真金呈现，成为列宁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的精神旗帜，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尝试了诸多“主义”都失败后的最终选择，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中国社会现

实、开展社会革命的思想指引。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质和使命意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束之高阁的空洞理论，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的最高宗旨就是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同时，它明确指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自身和整个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实践为原点，主张人与世界的沟通应采取实践的态度，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辩证法”突出自身的哲学旨趣。在20世纪初，西方种种思想、种种主义纷纷传到中国来，唯独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扎根，更深层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质。当时形形色色的“主义”、五花八门的流派，大多在旁征博引、放言高论，很少脚踏实地，践行理想。只有马克思主义独树一帜，它在十月革命后由理论变成了一种令人信服的“物质力量”，得到了实践的证明，使重践履、重躬行、重实效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惊天伟力，从而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孕育于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精神和革命品性。马克思主义有着崇高的奋斗精神，马克思本人就是充满伟大理想的奋斗者。马克思曾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⁹。为追求真理，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工作，虽遭受当权者的迫害、污蔑和驱逐，却从未停下奋斗的步伐。在马克思奋斗精神的浇灌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充满了自觉的辩证否定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论和精神实质包含着对现存一切不合理之处的批判与否定。在它看来，一切事物都是过程，都将最终走向灭亡，“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¹⁰。马克思主义在肯定资本主义的巨大物质创造力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彻底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精神的激励下，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展开了对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经济现状、封建文化乃至正在暴露弊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时候了”¹¹，要求建立“真正的‘工人政治’”¹²，并且毫不掩饰地投身到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论争中，旗帜鲜明地划清了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界限。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情怀和奉献精神。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理论最鲜明的底色。在马克思以前，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英雄史观甚嚣尘上。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认为绝对理念、上帝和超人是历史的主宰，决定历史的走向，而芸芸众生不过是历史的衬托和装饰，是历史舞台的观众而已。与之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描绘了人类历史长河的真实图景，确认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具有高尚的奉献精神。他们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推动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并指导了欧洲的工人运动。他们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确立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¹³的政治立场，以区别于旧有的一切剥削阶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奉献精神的感召下，平均年龄仅为28岁，家庭出身并非最低、投身革命并非迫于生计的建党先驱，常常抛妻别雏、抛家弃业，将人民引入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铸就 and 弘扬了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四、早期革命先驱艰苦卓绝的建党实践是生成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其时间跨度可以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算起，到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为止。这段时间所发生的推动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初具雏形到最终完成建立的一系列相关历史史实，如早期理论宣传、早期组织成立、中共一大和二大的召开等等¹⁴，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生成的实践基础。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十月革命前，已有西方来华的传教士、维新派启蒙思想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等不同人物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多是一鳞半爪，多是穿凿附会，多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载体的工人阶级也尚未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彼时的马克思主义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成为中国工人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开始广泛传播。李大钊是中国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对十月革命的本质和历史意

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⁵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关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真理，李大钊就把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的使命。1920年初，李大钊在北京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组织和领导北大进步学生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此前后，李大钊在其创办、指导或参与编辑的《每周评论》《新青年》《晨报》等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晨报》副刊专门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进行长达半年的译介，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启发了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开始转变自身“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¹¹的思想，萌发了组建革命政党的念头。而酝酿建党的具体实践，则始于陈独秀为避免反动军阀的迫害，由李大钊护送其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途中。两人都认为，要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造，没有坚强的政党来领导是不可想象的，两人约定分别在上海、北京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就是有名的历史佳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骨干，吸收青年学生、工人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并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人运动和扩大政党影响。中共一大召开时，“其中正在或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党员就有21人……占全国党员人数的2/5。”¹⁵

1920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¹⁶。1920年，陈独秀到达上海后不久，就以其个人声望和才能，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不久又与《新青年》同人达成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共识。时间约在1920年8月（也有5月、6月两种说法），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外力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共同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雏形。上海发起组成立不久，陈独秀就多次向李大钊转达尽快创建党组织和发展党员的意见¹⁷，又负责联系、派人指导或者具体组建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共产党组织，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由一到多的发展。

1921年，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正式成立。1921年7月底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纲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及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初心使命，选定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临时中央，“主义”“初心”“组织”三大成果标志着一个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正式建立。但是，作为一个新生政党，党纲在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上简单援引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条文，而未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进行考察，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也没有制定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党章。另外，当时加入党组织的大多是知识分子，纯粹的产业工人还很少，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还不明显。

1922年，中共二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建党。中共一大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决定暂时不组织正式中央机关，只成立临时中央局”¹⁸。此时选出的中央局具有过渡性质，组织机制并不完备。而中共二大召开时，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及其他决议案，规定了党的性质、宗旨和纪律等组织制度。这说明，党在二大时已建立相对完备的组织机制，实现了政党建设的重要突破。中共二大最重大的成果则是在科学分析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实现了党的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这表明，经过一年的历练和打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理论和政治已趋于完备。

五、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是塑造伟大建党精神的主体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创造伟大建党精神的早期历程中，广大人民群众觉醒是主体条件。在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引领下，工人阶级开始觉醒，他们从自发、自在的经济斗争转向自觉、自为的政治斗争，体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优秀品质。而一些早期革命先驱，为了建党大业，为了理想的实现，殚精竭虑，不怕牺牲，以其崇高的人格风范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基因和遗传密码。

一方面，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独特气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伴随大工业的产生而产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力量；饱受阶级奴役与压迫，对阶级宰制深恶痛绝，最有革命的坚定性与彻底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他们自己，因而拥有解放全人类和解放自己的崇高使命和责任担当。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世界无产阶级的一般优点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优点：深受三重剥削和压迫，苦难深重，革命的愿望和意志最强烈、最坚定；人数虽少但所处地域、行业相当集中，便于革命宣传，造成强大的革命影响；大多出身破产农民，易于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和壮大革命队伍，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普遍贫困，缺乏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便于接受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避免修正主义的影响。

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与生俱来的反抗和斗争精神。最初，中国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是一种自发的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整个阶级斗争的起点，是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的必经阶段”¹⁹。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阶级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逐渐从自发分散的、伴有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色彩的经济斗争转向自觉集中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渐浓的政治斗争。在1866—1895年的30年间，见于记载的47起反抗斗争中，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达35起。²⁰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工人“累计罢工150余次，超过辛亥革命前数十年的总和”²¹，但工人阶级“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²²。五四运动时，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首次摆脱资产阶级的附庸角色，开始作为领导阶级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不惜失掉经济来源……以唤醒国人的爱国觉悟”²³，以自愿、自觉的姿态，以决不妥协退让的斗争精神，赢得了五四运动的胜利。自五四运动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武器的中国无产阶级逐步觉醒，队伍持续扩大，为党的创建作好了必要的人才准备，也为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力量支撑。可以说，工人阶级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优秀品质孕育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建党精神。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人格风范形成了伟大建党思想的特质。时势造英雄，英雄带领人民书写历史。早期共产党的先驱就是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中国历史的英雄。他们以自身的知识和学问担当“社会良心”，代表社会良知，组成社会发展的思想库，推动中国革命政党的建立，是建党精神的具体化、人格化和个性化，是建党精神的直接塑造者、终身践行者与坚定传达者。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陈独秀，是“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李大钊，是华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杨匏安，是独立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恽代英，是以为党的事业牺牲为无上光荣的革命夫妻——向蔡同盟，是誓言洗刷四万万同胞屈辱的王尽美，是为革命肝脑涂地的陈潭秋，是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何叔衡，是为信仰宁死不屈的陈延年、陈乔年……多少革命先驱，以其优秀品质和人格风范孕育和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基因和遗传密码。限于篇幅，这里仅选择三个人物的突出表现、光辉事迹或人格特征作为典型和代表，简述其要。

陈望道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杰出代表。1920年乍暖还寒的春天，29岁的陈望道坚守在昏暗破旧的柴房里，费尽心血、废寝忘食地投身到《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之中。他从《共产党宣言》中品出了追求已久的真理之味，口食墨汁也能甘之如饴。真理的味道之所以如此甘甜，就在于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为无数革命者找到了始终不渝的努力方向。一本《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看了不下一百遍，邓小平喻之为“入门老师”，习近平总书记则多次讲过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

董必武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杰出典型。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董必武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使用“初心”概念的人，也是一生坚守初心、担当使命的模范。1919年，他通电全国：“现值外交失败，国内和会忽告停顿……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²⁴，第一次公开使用“初心”一词，表明了实现民族独立的心愿。实际上，还在青春年少时，董必武就怀着拯救家国的初心，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却因袁世凯窃权、社会腐败而报国无门。致力民族伟业，十年只是序章。直到遇见了李汉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才大彻大悟：“中国的独立……必须走列宁的道路”²⁵，从此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他以年近50的高龄爬雪山、过草地，随军长征。在党遭遇挫折时，他以其突出贡献、坚定信念和德高望重成为暗室里的一盏灯火。在晚年岁月，他初心不改，斗志犹存，始终想着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

李大钊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杰出楷模。不为个人计得失，一片丹心见忠诚，李大钊用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谱写了一心一意、一以贯之的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精彩乐章。在创党初期，李大钊“知有主义，而不知有家”，将自己的全副身心和工资

收入都投入到党的活动之中。他不仅自掏腰包为亢慕义斋购买书籍，还将工资的大部用于革命活动，剩下的资金则用于资助困难学生和贫苦百姓。这些慷慨义举常导致他家里面临断粮的窘境，为此，蔡元培不得不让会计在李大钊的工资中首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到其妻子手中，以维持其基本家用。在被捕入狱时，面对敌人的绞刑，李大钊视死如归，展现出一个革命者不屈的风骨和品质。对党忠诚和不负人民是高度统一的。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发出“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为功为罪，所不暇记”的铿锵誓言。他完全抛开个人得失，奋力打碎封建枷锁，矢志传播马列真理，就是为了改变莽莽神州满地兵燹、满目疮痍和民生凋敝的悲惨境况。

六、北京、上海和嘉兴是养成伟大建党精神的主要空间场域

城市的现代化与政党的现代性是密不可分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北京、上海、嘉兴以其独特的历史人文底蕴和经济地理优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地、产床和出生地。

首先，北京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之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红楼参观时指出：“北大……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²⁶。这一讲话阐明了北大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北大得以发轫与酝酿，是因为北京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北京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源。元朝以启、辛亥之前的北京，是三朝古都，是政治中心，同时又成为民族文化、南北文化乃至中外文化交流荟萃的中心，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文化底蕴。鲁迅在劝留友人时就说：“先生如离开北平，亦太可惜，因北平究为文化旧都，继古开今之事，尚大有可为者在也。”²⁷辛亥之后，清朝败落，北京城里王公贵族的府邸变成民国大学的新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蜚声中外的名校均坐落于此，这又进一步凸显了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不仅如此，北京还拥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以及丰富的建筑、文物、书籍等资源。因此，北京成为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荟萃之地。北京高校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成为造就新思想、活跃新风尚的桥头堡。其中，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中心。

北京大学拥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科学、民主之风由此进入北大。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陈独秀携《新青年》进驻北大，吸引胡适、鲁迅等崇尚新文化、新风尚的人才纷纷北上，使北大焕发清明之气，孕育兼容并包的文化气息。不仅如此，北大以其古旧的身体，倡导自由教育、民主精神和不拘一格的文化新风，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受北大影响的北京高等学府纷纷在自由、民主、包容的文化新风中开启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学习与研究，一大批具有独立意识、主体精神和强烈批判态度的新式知识分子由此诞生。他们以“秃笔”为枪，以“苦口”为炮，突破了封建文化对人民的禁锢，推动北京由旧文化的堡垒而成为新文化的中心，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北京大学拥有学以致用的学术风格和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身处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于一身的北京，又长期处于政治与学术斗争的漩涡之中，北京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往往在“做学术”和“干政治”两方面都有着较好的表现。五四前后的北大师生，经过政治历练和学术修养，变成了“做学术”和“干政治”的行家里手。在民族危亡之际，秉持“修齐治平”“学以致用”理念的北大师生，常常是“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¹¹，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动社会急剧变革。他们在北大红楼里秘密策划，又在红楼前发动了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五四运动；他们在红楼里研读经典，又带着红楼里生发的思想走入厂房车间，开展工人活动；他们在红楼里呼吁共产主义派的朋友组织起来，又在红楼里运筹、决策党的具体工作。

总之，北大红楼受益于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得益于北京大学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学以致用的学术风气，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和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创建之地。而北京新旧融合、中西融合、理想和实干融合的精神气质也养成了中国共产党追求理想、践行理想的精神特质。

其次，上海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产床。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²⁸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建和成立，受益于上海突出的经济条件、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阶级矛盾激化之地。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²⁹伴随着西方资本、技术、人才和文化的输入，20世纪初期的上海快速成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大都市，也快速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相对集中之地。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也推动上海成为阶级矛盾最为激化的城市。上海本地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4左右³⁰，但他们平均工资十分微薄，生活处境异常艰难。日本学者官吉坂俊满的《中日劳动条件比较》显示，英美男职工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男工的10倍，而英美女职工的平均工资是中国女工的5.6倍，日本职工的平均工资也数倍于中国职工。³¹五四之后，上海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工人运动愈加频繁。随着工人阶级觉悟程度的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成为历史必然。正如毛泽东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³²。

上海具有独特的政治环境。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步步紧逼下，近代中国的上海在被迫开埠之后逐渐形成“一市三治”的治理格局，上海租界因此成为“国中之国”，享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也正因如此，租界具有中国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独特建党优势：行政管控存在诸多罅隙，便于开展革命活动；战时处于中立状态，社会相对安定平静；华洋杂居，便于与共产国际开展联系等。特别是在五四之后，为避开北京愈加恶劣的政治文化环境，大批离京南下或留学回国的革命志士、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选择栖息上海，巧妙地利用上海租界独特的政治环境开展秘密建党活动。

上海具有东西融合的海派文化环境。上海开埠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地位日趋突出，逐渐成为中国东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中心。因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宽松，上海的出版机构、报纸刊物、信息渠道也十分丰富，为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俄共代表费奥多尔曾称赞“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³³。十月革命结束后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就最先报道了这个震撼寰宇的大事件。³⁴邵力子在相关回忆文章说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时，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三人写得较多……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那时，马克思主义书籍主要从日本传过来。”³⁵1920年陈独秀自京返沪，也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并转变《新青年》的办刊方向，使《新青年》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此前后，《觉悟》副刊、《星期评论》和《学灯》等杂志报纸也聚集在《新青年》周围，宣传社会主义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的到来。

总之，依托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以及独特的政治与文化环境等优势，上海成为阶级矛盾的激化之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传播中心以及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地。而上海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开放的政治环境与东西融合的文化氛围，也养成了伟大建党精神鲜明的现代性特质和斗争品格。

再次，南湖红船是伟大建党精神产生的“摇篮”。一方面，嘉兴南湖具有较强的安全性与隐蔽性。一大会议突遭骚扰，代表们警惕性加强，另择中共一大会址时，安全性成为首要考虑条件，而嘉兴南湖就具有这样的优势。嘉兴南湖风光旖旎，四季宜人。乾隆六下江南，就曾多次登临烟雨楼，赋诗作画。但近代的嘉兴仅是一个衰落的小县城，并非反动统治的经济、政治或文化中心。而嘉兴南湖既没有杭州西湖的热闹，也缺乏上海租界的繁华，因此并不为军阀或外国势力所严密控制，也没有密探经常出没，是一个不为人所注目的旅游风景区。因此，一大代表在嘉兴人王会悟的带领下，以赏景之名，泛舟南湖，密谈建党大事。

另一方面，嘉兴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便捷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的人文环境。嘉兴与上海山水相连、文化相近、经济相融，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嘉兴连接上海与杭州，处于沪杭铁路的中程，车次多、车程短，可以实现当天往返，交通十分便利。嘉兴自古以来就学风兴盛，奇才秀士辈出，在近代就涌现了王国维、蒋百里、沈钧儒这样一些学术大师、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直接参与建党活动的一批进步青年中就包括了嘉兴的先进知识分子沈雁冰、沈泽民、王会悟等人。而王会

悟是李达的夫人，又直接参与中共一大的会务工作，在她的建议之下，选择嘉兴南湖开会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嘉兴南湖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出生地。

注释：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75 页。
- 2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5 页。
- 3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90 页。
- 4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07 页。
- 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6、228 页。
- 6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1 页。
- 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3 页。
- 8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 页。
- 9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4 页。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4 页。
- 11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427、104、424 页。
- 1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1 页。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11 页。
- 14 郭国祥、覃雅兰：《建党精神内涵新探》，《湖北社会科学》2021 年第 6 期。
- 15 萧超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 16 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14 页。
- 17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0-331 页。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89、68 页。
- 19 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 1 卷第 2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 页。

-
- 20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08 页。
- 21 石仲泉、鞠俊俊：《热话题与冷思考——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 年第 2 期。
- 22 王建初、孙茂生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43 页。
- 23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919-19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0 页。
- 24 《董必武传》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3 页。
- 25 《董必武年谱》编纂组：《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2 页。
- 26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人民日报》2021 年 6 月 27 日。
- 27 《鲁迅全集》第 1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0 页。
- 28 《梦想，从这里启航——记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人民日报》2017 年 11 月 1 日。
-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7 页。
- 30 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4 页。
- 31 官吉坂俊满：《中日劳动条件比较》，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 1 卷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22 页。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2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24 页。
- 3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5 页。
- 34 《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民国日报》1917 年 11 月 10 日。